

试析中国博物馆宏观管理体制发展历程、特点及趋势

杨玥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100006

摘要 中国博物馆诞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其宏观管理体制主要经历了4个阶段的调整,有效推动和加强了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目前,中国博物馆宏观管理呈现出分级属地管理、管理主体多元、管理方式多样、法制化建设深入等特点;同时,文旅融合日益紧密、行业协会及联盟推动作用显著、以数字化建设和人才机制建设为抓手也成为了博物馆宏观管理体制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 中国博物馆;管理体制;分级属地管理;文旅融合

博物馆是保护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中国博物馆植根于中国历史、地域和文化之中。近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高速发展,发展数量、发展质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截至2020年,博物馆备案登记数量已经达到5788家,接待观众超12亿人次/年^[1],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对博物馆的服务提出

更高的要求。为满足公众需求,切实推动和加强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回顾中国博物馆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进一步提高中国博物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中国博物馆宏观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

博物馆宏观管理体制是在中国文化事业发展框架之下形成的博物馆管理政策、管理机构、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等的总称,是博物馆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发挥方向引领和统筹规划作用。在中国,博物馆管理主要通过文化立法和文化政策的方式实现,其中党的文化政策发挥了最根本的指导

收稿日期:2021-03-24;修回日期:2021-05-29

基金项目: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智库项目(18ZK08)

作者简介:杨玥,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博物馆宏观管理、魏晋南北朝史,电子邮箱:yangyue@chnmuseum.cn

引用格式:杨玥. 中国博物馆宏观管理体制的形成及特点[J]. 科技导报, 2021, 39(12): 109-115;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21.12.014

作用,从发展历程来看,主要经历了4个阶段。

1.1 萌芽期(1905—1949年)

近代以来,受欧洲近代博物馆迅速发展的影响,中国人和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建立博物馆,为规范博物馆事业管理,1905年清政府成立学部专门司,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设立教育部,南京国民政府由大学院负责管理博物馆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博物馆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大会上,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其中规定“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示纪念”^[2];1934年中央革命博物馆成立,中国博物馆“首开中国革命文物征集保护之先河”^[3];抗日战争时期,蒙古文化陈列馆在陕甘宁边区落成,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成为名誉理事^[4];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建立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逐步恢复博物馆事业。

这一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中国刚刚萌生,数量少、体量有限,对博物馆的管理也更多借鉴西方博物馆管理经验,如建立专门的博物馆管理职能部门,但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制度法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博物馆事业,增加了对革命文物的搜集和展示,保存了珍贵的民族记忆。

1.2 奠基期(1949—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征集革命文物令》,明确保护珍贵文物和文化遗址,许多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前往博物馆进行视察^[5]。随后,文化部设立了文物事业管理局,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各地方也都设置了相应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1951年10月,文化部颁布了《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内容设计上要体现地方性和综合性,避免强调地方忽视全国的偏向。1956年5月,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提出了博物馆的基本性质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博物馆的基本任务是“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性

二务”理论,明确了中国博物馆的功能与职能^[6]。

这一阶段是中国博物馆管理体制构建的奠基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管理逐步深入,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博物馆事业的指导方针;二是博物馆的教育职能强调政治导向;三是注重协调经济恢复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有博物馆300余座。

1.3 发展期(1979—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响应党拨乱反正的号召,文化领域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逐步调整理顺博物馆工作。1979年6月,国家文物局在全国博物馆工作座谈会后颁布了《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工作条例》,对博物馆藏品、陈列、群众工作、科学研究、组织机构、队伍建设等多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确定了博物馆工作的基础框架。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发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11月,在总结1949年以来文物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对馆藏文物的定级建档、调拨交换等文物交流进行了初步规定,包括博物馆工作在内的文物工作终于实现了基于法律的正常运转^[7]。2006年1月,文化部颁布的《博物馆管理办法》成为继《文物保护法》后又一部重量级法规。该办法对博物馆设立、藏品管理、展示服务等诸多业务进行了详细规定,初步明确中国博物馆法人设立采取审核、备案加登记的许可主义原则,为进一步区分中国各类博物馆的法人性质、类型和构成要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有关组织管理制度奠定基础。2008年1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向社会免费开放的通知》,启动了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工作。博物馆、纪念馆推陈出新,提升了服务质量,提高了博物馆的专业水准。

这一阶段是中国博物馆宏观管理体系的大构建大发展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成为这一时期博物馆的建设的突出特色。在法律法规方面,1982年颁行的《文物保护法》使中国文博事业管理依据从政策层面上升到法律,随后各项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不断出台,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协定、备忘录也陆续签订,博物馆管理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在功能使命方面,这一时期博物馆教育功能开始由政治导向转向文化导向,成为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窗口。

1.4 繁荣期(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博物馆工作,多次到博物馆调研考察,就博物馆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对博物馆工作作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明确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为博物馆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2015年3月,《博物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和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规范博物馆设立、变更和终止程序,提升藏品管理水平,加强博物馆的教育、研究作用等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做出规定,同时公平对待非国有博物馆设立条件、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税收优惠等方面与国有博物馆不一致问题,为促进中国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提供法制保障^[8]。与之前颁布的《博物馆管理办法》不同,《条例》在博物馆法人设立原则的选择上采用了登记加备案模式的准则设立主义原则^[9],根据《条例》第12条至15条的规定,博物馆的设立不再需要所在省级文物主管部门出具审核意见,又增加了“应当向馆址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备案”(而非此前《博物馆管理办法》第12条中提到的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这一“不产生强制效力的宣示性准行政行为^[10]”,从行政许可行为向行政确认行为转变的同时,即标志着博物馆设立准入门槛的降低,也对博物馆行业监督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颁布并于次年实施,该法界定了博物馆属于公共文化设施,并从建设与管理的角度,规定博

物馆“根据其功能定位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吸收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和公众参与管理。”2017年11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三十次会议完成了《文物保护法》的第五次修正,成为指导博物馆工作最重要、最直接的法律。201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完成第二次修正,从旅游经营角度规定公益性博物馆“除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珍贵文物收藏单位外,应当逐步免费开放。”2020年11月,国家文物局官网发布《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文物保护法》再次面临大规模修订,征求意见稿从体例上将现行法律的8章80条扩充至9章107条,从丰富文物定义和类型、加强馆藏文物保护利用、规范文物流通市场监管、加强文物保护监督检查等多方面进行更新和完善。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2016年)》《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2016年)》《国务院关于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报告(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7年)》《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2018年)》《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等文化新政,2017年《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文化部颁布)、《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文物局颁布)的相继出台,对博物馆的事业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博物馆的功能从原来传统保护、收藏、研究与展示逐步向公共文化服务延伸,中国博物馆事业由原有的文物保护单一管理体制,进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双重管理体制并存的时代,博物馆事业宏观管理目标开始向全面提升发展质量的方向转变。

2 中国博物馆宏观管理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各地开始了建设博物馆的浪潮,博物馆数量以每年近百家左右的增速不断攀升,这对博物馆的宏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更加科学规范地管理博物馆,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前景。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博物馆宏观管理体现出以下特点。

2.1 分级属地管理

中国博物馆的管理总体上实行的是分级属地管理体制。《文物保护法》规定,由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文物管理工作,地方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管理工作,明确了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的原则。根据博物馆规模大小、藏品多少、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不同,分别由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市)、县(区)4级有关行政部门对其实行分级管理。根据《2019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统计,2018年全国有4918家博物馆,从隶属关系分类,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恭王府博物馆由文化和旅游部直管,146家博物馆由各省区市管理,1078家博物馆由地市管理,剩余3691家博物馆由市县级管理,大都隶属于同级的文化单位^[1]。以省级博物馆为例,黑龙江、山东、河南、广东、广西等地的省博属于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事业单位,而陕西、山西、甘肃、四川等地的省博则属于省文物局的直属事业单位,部分省份如四川省、山西省省博还经历了由省文旅厅直属到省文物局直属的变更。

2.2 管理主体多元

由于机构设置的不同,中国博物馆所属系统和行政隶属关系交叉,管理模式比较复杂。在2018年统计的4918家博物馆中,3374家博物馆属于文物部门,551家属于其他行业部门,还有993家属于民办博物馆^[1]。目前,中国国有博物馆大多隶属于文化和旅游部系统,但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博物馆分别由不同的行政部门管理,其中综合类、历史类、艺术类、纪念类等博物馆属文化文物部门领导管理,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属科学研究部门领导管理;校办博物馆属教育部门领导管理;地质、农业、纺织、煤

炭、邮电、军事等行业类博物馆分别属行业部门领导管理,多数情况下是依托于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具体工作中,国务院有关部门通过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关厅(局)对地方的博物馆进行业务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及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通过各省文化厅或文物局对文化系统的博物馆进行业务指导。

2.3 管理方式多样

中国绝大多数的博物馆属于国有事业单位,即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公益性社会服务组织,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系内由上级行政机关管理,从创办到事业投资管理都依靠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政府常充当博物馆日常的管理主体和财政支持主体。在计划经济时代,博物馆的行政主管部门作为上级机关,以下达工作任务的形式,直接参与博物馆的管理。行政部门管理各级行政部门对直属博物馆的领导管理主要是:检查、督促执行国家颁发的有关管理博物馆事业的方针、政策和法令;审批事业发展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审查预算,核拨经费,批准决算;核定人员编制,任命馆长;审定陈列展览方案;审批藏品调拨、交换、注销。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职能转变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政府角色的重塑和职能的转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博物馆管理的自主权也在不断的扩大,1999年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对事业单位进行登记管理,目的是使事业单位获得独立法人资格,以便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并规范其市场行为。近年来,博物馆的管理体制改革和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2010年颁布实施的《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中央和地方共建国家博物馆应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实行理事会决策、馆长负责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强化公益属性,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博物馆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不再是以直接经营博物馆、维持所属博物馆的生存为目的,而是指

导协助博物馆的工作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文化服务。

2.4 法制化建设不断深入

作为中国文化领域的第一部法律,《文物保护法》是响应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号召的成功尝试,是保障博物馆事业有序发展的基础。1982年至2017年,《文物保护法》经过5次修订逐步完善,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有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对现行的文物保护管理体制和中国博物馆发展体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紧随其后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在经过3次修订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权责也逐步开始明确,即应当制定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研究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文物保护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2006年文化部发布实施《博物馆管理办法》强调了博物馆“展示与服务”,鼓励结合博物馆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和服务活动,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2015年通过的《博物馆条例》是一部全面推进博物馆事业依法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行政法规,为博物馆规范管理提供了基本遵循,对博物馆社会服务做出了明确要求,为博物馆科学定性、准确定位、合理定则提供了重要依据。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文化需求日益提高,博物馆的功能与价值不断拓展,更不时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然而,博物馆在管理中与旅游、教育、宗教等行业主管部门的协调机制还没有充分建立。观察涉及博物馆管理的条款(图1)可以发现,对“博物馆”的讨论常与“文物”“保护”“历史”“人民”等热词相伴出现;探讨博物馆的管理时,法规中多以“文物保护单位”“文物收藏单位”“公共文化设施”统论之,且政出多门、政令不一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12],涉及博物馆的制度内容散见于各项法律、条例和办法当中,各效力层级间规范性文件的冲突亟待一部上位法来进行系统整合和优化提升。博物馆备案、藏品的鉴定评估、法律责任等制度空白仍然有待通过立法手段来予以规制。尽快制定《中国博物馆法》,改变目前中国尚无专门性的博物馆法律现状的呼声在文博业内日趋强烈。2020

年“两会”期间,委员们呼吁推进中国博物馆法律制度建设,尽快制定博物馆法,通过高位阶的法律明确博物馆的定义与法律职能,协调博物馆行政法规与其他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关系,以健全博物馆法律制度体系^[13]。



图1 博物馆管理法规政策热词图

3 新时期博物馆宏观管理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博物馆发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秉承改革创新的原则,经历过起伏与波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智慧。在新时期,中国博物馆的管理着眼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更加注重统筹协调、跨界融合,呈现出新的趋势。

3.1 文化发展与旅游事业的结合日益紧密

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出要促进旅游与文化融合,培育以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和实践活动为支撑的体验旅游、研学旅行和传统村落休闲旅游。2018年3月,国务院通过机构改革决定将文化部撤销,设立文化和旅游部,奠定了今后文化事业协同旅游事业相互促进发展的总基调。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12月,文化和旅游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对促进文旅融合做出了明确规定,鼓励和支持依托旅游资源创作生产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

3.2 行业协会及博物馆联盟推动作用日益显著

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博物馆学理论的日趋完善,各类博物馆协会也在蓬勃发展,成为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国内已成立了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非国有博物馆协会,各省、市、自治区博物馆协会,有条件的县市也成立了地市级博物馆协会。通过组织学术活动、出版学术刊物、承担研究课题、组织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培训课程、搭建馆际交流与合作平台等方式,逐步建立了政府、行业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博物馆监督管理机制。近年来,博物馆联盟渐成趋势,博物馆间纷纷组织成立区域联盟,区域博物馆联盟成为了博物馆间资源优化整合、塑造文化品牌,协同文旅发展等全域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联盟还呈现出国际化趋势。2018年11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首届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大会召开,来自21个国家的30多所文博机构派代表汇聚一堂,探讨未来合作计划,签署展览合作框架协议。通过行业协会、博物馆联盟等形式,博物馆携手并进,释放博物馆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不但推动了中国博物馆管理的现代化、规模化,更提高和发挥博物馆社会效益。

3.3 数字化建设和人才机制建设是博物馆管理重要抓手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推进数字化建设已经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2017年,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博物馆工程。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修订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在第38项“文化”中新增加“智慧博物馆建设”,是进一步鼓励、引导投资智慧博物馆建设技术的重要依据。同时,面对日趋严重的人才断

层断层问题,2015年,国家文物局面向文博行业发出通知,宣布与西北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合作,实施“高层次文博行业人才提升计划”,旨在通过学历教育与文博行业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的方式,在提高文博行业在职人员学历水平的同时,培养出一批具有文博专业素养的实践型、创新型高层次专业人才。2019年12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关于深化文物博物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完善符合文博行业特点的职称制度,以推动文博专业人员队伍结构更趋合理,为促进文博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4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博物馆定义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博物馆发展迅速、成就斐然,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中国人民文化自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判断,提出了坚持新发展理念、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新要求。当代中国博物馆更要明确自身的使命担当,不断完善管理能力提升管理水平,为切实推进博物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中国博物馆事业繁荣发展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刘玉珠.“云展览”开启“互联网+”时代博物馆服务新形态[EB/OL]. [2020-05-27]. http://www.ncha.gov.cn/art/2020/5/27/art_2353_161025.html.
- [2] 谭克绳, 欧阳植梁.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史简编[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352.
- [3] 史勇. 中国近代文物事业简史[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9: 158.

- [4] 邓沛. 延安公祭成吉思汗的活动[J]. 文史精华, 2001(4): 22-23.
- [5] 苏东海. 博物馆学在中国[M]//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15.
- [6] 柳彦章. 关于省级博物馆性质与任务问题的反思[J]. 北方文物, 1991(4): 124.
- [7] 中国文物报社. 中国特色文物理论体系预研究[M]//国家文物局编. 文物政策理论研究辑要.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7: 11.
- [8]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博物馆条例》[EB/OL]. [2015-03-02].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02/c_1114483541.htm.
- [9] 焦晋林. 法治视野下的博物馆研究[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64.
- [10] 刘岳. 行政登记行为性质分析及其司法审查[J]. 衡水学院学报, 2007(2): 10.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286.
- [12] 弘博网. 全国两会进行时, 哪些提案与建议与文博行业有关[EB/OL]. [2020-05-25]. <http://www.hongbowang.net/news/yj/2020-05-25/16540.html>.
- [13] 民进中央. 呼吁推进博物馆法律制度建设[EB/OL]. [2020-05-19]. https://www.mj.org.cn/xwll/mjyw/202005/t20200519_226651.htm.

The development cours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end of the macro-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ese museums

YANG Yu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he macro-management system of Chinese museum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of adjustment, effectively promo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useums. The macro-management system of museums in China features the hierarchical territorial management, the multi-subject management, the multi-mode management, and the in-depth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touris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the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the museum alliance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and the digital construction and the talent mechanism construction have become a new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useum macro management systems.

Keywords Chinese museum; management system; hierarchical territorial management;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



(责任编辑 徐丽娇)